

用「中華」這樣的字眼呢？

Benedict Anderson 認為清朝統治者未試圖將人民甚或官員滿洲化，主要是因為統治者的優越地位是奠基於「差別」而非類似，這和沙皇時代的俄羅斯一樣，王室說的是法語，以此表示他們比說俄語的賤農高級。但是到了清朝末期，為了利用人民對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仇視，才嘗試打出「中國傳統」之名。<sup>82</sup>

中國自秦「統一天下」後，並沒有出現類似近代西方的「民族國家」或「民族主義」觀念，直到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勢力開始入侵，對中國造成極大壓力，1895年以後這股壓力驟然升高，產生「合群救亡」與「保國保種」的迫切感，再加上當時傳統政治與文化的解體，還有新型傳播媒體網絡的出現，使這些條件與傳統族群意識相配合，產生了中國的民族主義。<sup>83</sup>這時所談的民族主義，特別強調共享的文化特質和具體的共同血統來源，也就是對「文」與「種」的重視，構成了今日中文世界的日常語彙中，對「民族」的基本意義，而這和學術研究所運用的概念意涵有些差距。

清廷、立憲派和革命派三個政治勢力高舉救亡圖存的大纛，除在中國內部的鬥爭外，其勢力也各自延伸至海外，尤其是傳播新的觀念，使馬來亞華人的政治觀開始萌芽與轉化。

但是清廷、立憲派或革命派所鼓吹的民族主義概念，在內涵上有相當差異，清廷只提倡要效忠朝廷；立憲派要的是光緒皇帝復位後，透過制度改革救中國；而革命派所鼓吹的民族主義範圍較廣泛，即不要皇帝或君主統治的皇朝，而是致力建設中國式的民族國家，同時其主要組成部分是反滿主義。<sup>84</sup>所以清廷與立憲派較傾向於國家概念的打造，就是應以中國作為一個領土國家，以獲取這領土境內

<sup>82</sup> 中國時報，2000年4月23日，第11版。

<sup>83</sup> 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洪泉湖、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初版（北市：東大出版社，2002年），頁232-235。

<sup>84</sup> 顏清煌，「新加坡和馬來亞華僑的民族主義(1877-1912)」，*海外華人史研究*，初版（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年），頁229。

所有民族的認同；革命派則訴諸於傳統的族群意識，就是近現代以前住在中國本土的大多數漢人，長久以來，多多少少都有一種「同文同種」的意識與感覺，由於這些共同的根源紐帶(primordial attachments，或譯為天賦)，使他們有著相當程度的生命共同體的感覺。<sup>85</sup>從興中會成立到辛亥革命，孫中山所闡揚的的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小民族主義」，以漢族為中心，將其他民族自漢族劃開，特別是滿族。這可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驅逐韃虜」列為會員誓詞中四大口號的第一個口號，可以明顯看出會員們對這個主張的認同。<sup>86</sup>而這種過度宣揚漢族的口號，對身處異地的華人也有一定的影響，不少原本就有點輕視其他族群的人，更加強了這種認知。

「中華」這個概念提供了很複雜的內容，它可以包括文化、地理和血緣等，因此各派可以各取所需做宣傳，但是卻同樣提供了相近的想像，把中國視為一個整體，而不只是一個省或地區，讓不管對身在國內或外的人民，在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下彼此建立聯繫，盼藉此凝聚力量「復興中華」。

1877年，清廷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主要目的就是加強海外華人的民族意識，所以清廷領事開始資助華人的文化活動和宣揚華人價值觀，同時培養對清廷的政治效忠。<sup>87</sup>到了1893年，清廷也在檳榔嶼設副領事，更積極介入馬來亞華人社會。

1900年後，立憲派的康有為與革命派的孫中山也分別到馬來亞活動，宣揚各自的理念。立憲派與革命派人士在馬來亞爭取同情及招攬同志外，主要的工作還是辦報宣傳理念，<sup>88</sup>但是當時受過教育的華人不多，革命派人士為了更廣泛宣傳革命理念，就創辦劇團傳播相關訊息，有效的將革命訊息傳達給廣大未受教育的群眾。<sup>89</sup>由於革

<sup>85</sup> 張灝，頁235。

<sup>86</sup> 朱滋源，「孫中山民族主義的變與不變」，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初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440。

<sup>87</sup> 顏清煌，1998年，頁28。

<sup>88</sup> 朱自存，頁13。

<sup>89</sup> 顏清煌，1998年，頁34。

命派有相當完善的組織(同盟會)，明確規定的政綱，更有發達的宣傳網絡，因此在馬來亞華人社會有著比清廷和保皇派發揮更大的影響力。<sup>90</sup>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不再由「可恨」的滿族人統治，而是由華人所熟悉的廣東人或福建人所治理，自然加速了華人對祖國的認同。<sup>91</sup>從1911年至1920年代，中國國民黨在馬來亞的活動更加活躍，除在多個城鎮設立黨組織，並設置華文學校，以國語(華語)取代各地方言，成為各方言群的溝通工具，有效突破彼此的藩籬，再加上馬來亞華文報紙，除了報導許多中國國內發生的重要事件外，也常發動以中國為效忠目標的活動，<sup>92</sup>強化馬來亞華人對中華的想像，凝聚馬來亞華人對中國的政治認同，並提供當時面對內憂外患的中國國民政府，在財力與人力的支援，這也造成日後馬來人對華人的誤解和疑慮。

所以這段時間的國民黨是以語言為工具，透過學校、報紙等管道，積極建構華人的想像共同體—中國，使馬來亞成為大中國意識的延伸。

當時英殖民政府也發現華人內部這個趨勢，於是開始展開各種壓制措施。對馬來亞的華文教育，英殖民政府原本採取較放任的態度，但是英官員逐漸發現，華文學校與中國的連結日深，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大批華人選擇將子女送入華校就讀，未來華人可能都被捲入中國民族主義的氛圍內，進而視中國而非馬來亞為祖國，這將破壞馬來亞成為「不列顛國協」中一個自治政府的先決條件，就是建立一種馬來亞精神和共同的民族意識，<sup>93</sup>進而影響英國在馬來亞的利益。

<sup>90</sup> 顏清煌，1992年，頁229。

<sup>91</sup> 王賡武，「海外華人：未來中的過去」，*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初版(美國：八方文化，2002年)，頁39。

<sup>92</sup> 古鴻廷，頁78。

<sup>93</sup> 王賡武，1969年，頁173，註6。

尤其在1919年6月，檳城、新加坡及吉隆坡三地，曾因凡爾賽公約有不利中國的條款，進而引發示威事件；英殖民政府舉行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慶典，也遭華人公開抵制。在這些事件中，華校學生和教師異常活躍，促使英殖民政府採取高壓手段凍結華人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因此在1920年10月29日頒布《1920年學校註冊法令》(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 1920)，矛頭指向華文教育，以管制華校師生參加政治活動。<sup>94</sup>

1925年起，英殖民政府開始採取措施壓制國民黨在馬來亞的活動，但是國民黨仍繼續成長，新的國民黨分部繼續在馬來亞增加。<sup>95</sup>同時為防止華語學校不利殖民統治，英殖民政府頒布各種條例，試圖防止馬來亞華人產生效忠中國的政治意識，但是仍未能有效阻止這種趨勢。<sup>96</sup>1929年，英殖民政府實施「移民限制條例」，主要就是禁止具有「效忠中國」傾向的華人移入馬來亞。<sup>97</sup>

經過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種子逐漸萌芽後，華人雖然仍汲汲營營於經濟利益的取得，對中國情勢也開始關心，至於馬來亞本土的問題較為冷漠，除了因為語言、教育背景及出生所在地等因素外，英殖民政府的態度也是一重要因素。英國政府對華人的政策，較為猜疑與消極，他們總覺得華人心向祖國，尤其從1930年代起，英人就有一種「馬來亞可能變成中國一省」的恐懼，<sup>98</sup>同時又不設法拉攏華人，讓華人心甘情願坐大英帝國忠心耿耿的屬民，<sup>99</sup>例如在土地政策上，英殖民政府制定「馬來保留地法令」，撥出一些土地給馬來人，在不得轉賣給非馬來人，華人在無法取得土地的情況下，只好從事商業、橡膠與錫礦等行業，許多人必須經常遷徙與流動，自

<sup>94</sup> 陳綠漪，「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展」，林水椽、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初版(吉隆坡：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年)，頁289-290。

<sup>95</sup> 古鴻廷，頁115。

<sup>96</sup> 同前註，頁80。

<sup>97</sup> 同前註，頁138。

<sup>98</sup> 楊建成，1982年，頁56。

<sup>99</sup> 楊建成，1972年，頁92。

然對馬來亞這塊土地的認同，就比不上家鄉中國了。<sup>100</sup>

在建構「中華」意識的過程中，日本對中國的軍事與經濟侵略也是一大推力。日本人在中國的行徑，激發馬來亞華人展開排外運動，使民族意識逐漸滋長，慢慢把馬來亞華人的視野擴大，把他們對「群」的認同，從方言群或其他地方性團體，擴大到整個中華民族，進而產生民族意識。<sup>101</sup>二次大戰期間，日人對華人的殘暴作為，讓華人感受到彼此是命運共同體，族群的認同意識逐漸滋長。

戰後初期，國民黨在馬來亞的力量擴大，在各地增設支分部，其領導人皆是資產階級，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每年雙十節，就大肆宣揚三民主義的優點，並歌頌國民黨領導人的豐功偉績，<sup>102</sup>尤其中國擠身世界強國之列，讓海外華人極為雀躍，想不到積弱多時的中國終於站起來了，使中國意識更為強烈。

1947年，新加坡的《南僑日報》針對馬來亞未來的政制，做了一次民意測驗。在受測的24,012人中，主張做馬來亞公民，同時不脫離中國國籍，有22951人，佔總人數的95.6%；756人主張脫離中國國籍，做馬來亞公民，佔3.1%；23人主張保有中國國籍，佔0.1%；其他282人未表示意見，佔1.2%。<sup>103</sup>從這個調查中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華人仍希望具有雙重國籍，堅持只擁有中國國籍者還不及千分之一。

<sup>100</sup> 張曉威，頁44-46。

<sup>101</sup> 古鴻廷，頁147-148。

<sup>102</sup> 崔貴強，1998年，頁145。

<sup>103</sup> 崔貴強，1990年，頁172-174。

表 3-5 1924-1929 年馬來聯邦華人受教育情況

年 份	英 校(%)	華 校(%)	學生總人數
1924	33.5	66.5	18,321
1926	29.7	70.3	24,018
1928	27.0	73.0	29,262
1930	28.5	71.5	31,221
1932	30.8	69.2	28,676
1933	26.5	73.5	30,316
1935	21.7	78.3	37,697
1937	17.6	82.4	48,196

資料來源：Philip Lok Fook Seng, *Seeds of Separation: Education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92.

## 貳、國家認同的轉向

馬來亞華人從廿世紀初所建立的「中華」意識和認同中國的取向，經過二次大戰後，因內外環境的迅速改變，面臨了轉換的危機，華人必須在國家認同上作出選擇。

這些因素大致上可以分為內在與外在因素：

### 一、內在因素：

(一)英殖民政府更嚴格限制出入境和移民：1950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共政權成立滿週年的日子，英殖民政府實施回境簽證條例，規定持居留證者，離境後欲重返馬來亞，需再辦簽證。新條例造成華人強烈不滿，並提出抗議，但英殖民政府不肯讓步，強調實施是為了防共。不過，新條例中也規定，凡是英國公民或當地公民不受新條例限制。<sup>104</sup>同時，英殖民政府也頒布移民統制條例，嚴格限制移民入境，後來更變本加厲，規定居民不

<sup>104</sup> 崔貴強，1990年，頁291-292。

得擅自到中國大陸，否則返回馬來西亞時，可能會被扣押。<sup>105</sup>英殖民政府的這些政策，逼迫華人必須做出選擇，因此，爭取成為馬來亞公民，已成必然的趨勢。

(二)馬來民族主義的聲勢強勁：在1920-30年代，馬來社會已出現三批不同的菁英份子鼓吹民族主義，這些馬來菁英份子分別是受阿拉伯教育的宗教改革者、受馬來教育的本土知識份子和受英文教育的官僚。<sup>106</sup>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殖民政府為有效壓制華人，使出各種籠絡馬來人的手段，也鼓舞了馬來民族主義。戰後，英政府建議成立馬來亞聯邦，賦予非馬來人與馬來人同等的政治地位，引起馬來人的恐慌，在翁查化的帶領下，發起了群眾抗議行動，終於迫使英殖民政府取消計劃，這次的抗議行動也成了滋育馬來民族主義的催化劑。<sup>107</sup>馬來精英有意將馬來亞建立為「純馬來人」的國家，使華人未來的權益面臨重大考驗。

(三)本土出生的華人越來越多：英殖民政府在1933年頒布「外國人條例」，禁止男性移民，只准女性與兒童入境，使得華人的兩性數目逐漸平衡。在馬來亞本地出生的華人，從1921年佔華人總數的20.9%，到了1947年增為63.5%，1957年更達到74.5%。<sup>108</sup>這群土生土長的華人，對本土的認同較上一輩容易得多。

## 二、外在因素：

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後，其所施行的共產主義制度讓華僑望而卻步。1954年，中共僑務政策改變，鼓勵海外華人爭取成為當地公民。<sup>109</sup>1955年，中共宣佈放棄雙重國籍政策後，更加強了華人選擇

<sup>105</sup> 崔貴強，1990年，頁292-293。

<sup>106</sup> William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80), 引自祝家華，頁47。

<sup>107</sup> D.R. SarDesai 著，蔡百銓譯，頁317。

<sup>108</sup> 楊建成，1972年，頁14。

<sup>109</sup> 謝劍、陳美萍，「族群認同與文化適應：以馬國雪隆地區客家社團的發展為例」，第四屆世界

長住馬來西亞。<sup>110</sup>面對大環境的轉變，絕大部分的華人接受了現實，選擇加入一個即將誕生的國家，並以此為家。同時，也有一些青年學生與工人，嚮往祖國的新政權，收拾行囊回到中國。<sup>111</sup>

李炯才在1949到倫敦深造時，對當時個人心境上的改變，有以下的描述：

我雖然是中國人，受華文教育，但喜歡參加馬來亞人論壇的活動，多過到中國會所。我去過會所好幾次，總覺得不大自在，後來就不再去了。相反的，在馬來亞人論壇，我跟英國馬來協會會長拉薩、李光耀…及其他馬來亞人卻感志趣相投。參加論壇後，內心醒覺到我始終屬於馬來亞，而不是中國人。<sup>112</sup>

以上的內外因素影響，使絕大部分的華人在國家認同上，選擇了新興的馬來西亞，雖然對中國仍有濃厚情感，但祖國終究成了外國，尤其後來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共把用來維繫海外華人的家族摧毀破壞，進一步加強華人與中國和共產主義的離異，甚至對舊日古老的中國情懷也是致命一擊。<sup>113</sup>

從二次大戰以後，華人在國家認同上逐漸轉向，原本內部就相當歧異的華人社會，在政治認同上還是有若干差異，王廣武曾針對當時華人的政治認同，區分成三個不同的群體。

第一類群體：與中國政治維持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關注著自己與祖國的共同命運。它的政治色彩最鮮明，但由於遠離中國，又受到殖民地政府的限制，這一群體可能是最無力也最不得志的一群。

---

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2001年4月26-28日，台北：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104。

<sup>110</sup> 楊建成，1982年，頁105。

<sup>111</sup> 崔貴強，1998年，頁144。

<sup>112</sup> 李炯才，頁186。

<sup>113</sup> 王廣武著，許雅棠譯，「論東南亞華人認同之研究」，思與言，第30卷第2期(1992年6月)，頁155。



第二類群體：它是由精明而講求實際的多數華人組成，熱衷財富的累積和在本身社群內建立個人的聲望，對政治沒有太大興趣。

第三類群體：以馬來亞作為認同與效忠的對象，對本土政治的政治變遷能敏銳察覺和做出反應，主要是峇峇和馬來亞愛國主義者，是一較小的群體。<sup>114</sup>

這種分類在馬來西亞獨立前後，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不過在六十年代以後，馬來西亞整體環境有很大改變，這項分類已不太適用了。

### 第三節 華人在馬來(西)亞獨立後的處境

#### 壹、制憲爭議至「513事件」的發生(1957-1969年)

1940年代，馬來亞華人的中國意識達到高峰，隨後面臨大環境的轉變，華人了解在國家認同上必須轉向，但是這時已時不我予，馬來人在國家制憲過程中掌握了優勢，華人這時才驚覺問題的嚴重性。

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憲制公佈後，非馬來人在公民權取得上相當嚴格，到1950年，大約有35萬名華人自動成為公民，另有15萬名華人通過申請歸化為公民，因此在馬來亞聯合邦約200萬名華人中，僅四分之一獲得公民權。<sup>115</sup>

經過部分華人團體的爭取後，公民權修訂法令在1952年通過，申請條件稍微放寬，一直到1953年6月30日為止，約115萬名華人成為合法公民，但也只佔華人總人口的半數。<sup>116</sup>可見即使條件放寬後，不少華人對加入馬來亞仍興趣不高，這也顯示華人對馬來亞

<sup>114</sup>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The China Quarterly*, No.43(1970), pp.1-30.

<sup>115</sup> 崔貴強，1990年，頁329。

<sup>116</sup> 崔貴強，1990年，頁330。

的認同還處於遲疑階段，這也可從馬來亞聯邦首次大選中，觀察到華人的冷淡態度。

1955年7月，馬來亞第一次普選時，估計登記選民總數為128萬人，其中馬來人有1,078,000人(84.2%)，華人選民僅有143,000人(11.2%)，也就是在60萬(即華人成人人口的半數)有資格投票的華人選民中，不到四分之一的華人登記為選民，<sup>117</sup>以行使公民應有的權利。同年8月，東姑拉曼提出國家獨立計劃，並獲英國良好回應，使馬來亞向獨立之路邁進，這時華人才不得不積極爭取公民權，以確保獨立後享有公民的地位。

但華人社會內部在政治立場、經濟利益等紛陳，也沒有具精神感召力的領袖帶領，使華人在政治競爭中表現出群龍無首的局面。以馬華公會來說，是當時被英政府與巫統確認是華人代表的政黨，領導層的32名成員中，有26人是在當地出生，4人出生於中國，另兩名出生於香港與緬甸，同時他們大多數都是接受英文教育的商人或專業人士，<sup>118</sup>並獲得英殖民政府的支持。

但是這些領導人和華人社會基層並不熟悉，甚至可說是脫節的，像身為海峽華人的馬華總會長陳禎祿，就提倡「一個國家，一種人民，一個政府」的概念，<sup>119</sup>顯示他追求的是類似西方的國家概念，但是這樣的想法在當時的華人社會中，讓許多中國意識強烈且期盼或雙重國籍的華人相當不以為然。1956年9月，馬華公會的委員會議議通過了「國家第一、政黨第二、華人利益第三」的政治路線，把政黨利益置於整體華人權益之上，更引起許多華人的不滿。<sup>120</sup>

馬華與巫統在一九五五年大選中大勝後，兩黨進入了蜜月期，馬華不顧華人社會的普遍要求，在和巫統協商取得了唯一的土生公

<sup>117</sup> 同前註，頁345。

<sup>118</sup> Heng Pek Koon,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0-61.

<sup>119</sup> 陳禎祿，「一個國家，一種人民，一個政府」演講詞，馬華公會二十週年特刊，初版(吉隆坡：馬華公會總部，1969年)，頁171-173。引自張曉威，1998年，頁64。

<sup>120</sup> 崔貴強，1990年，頁339。